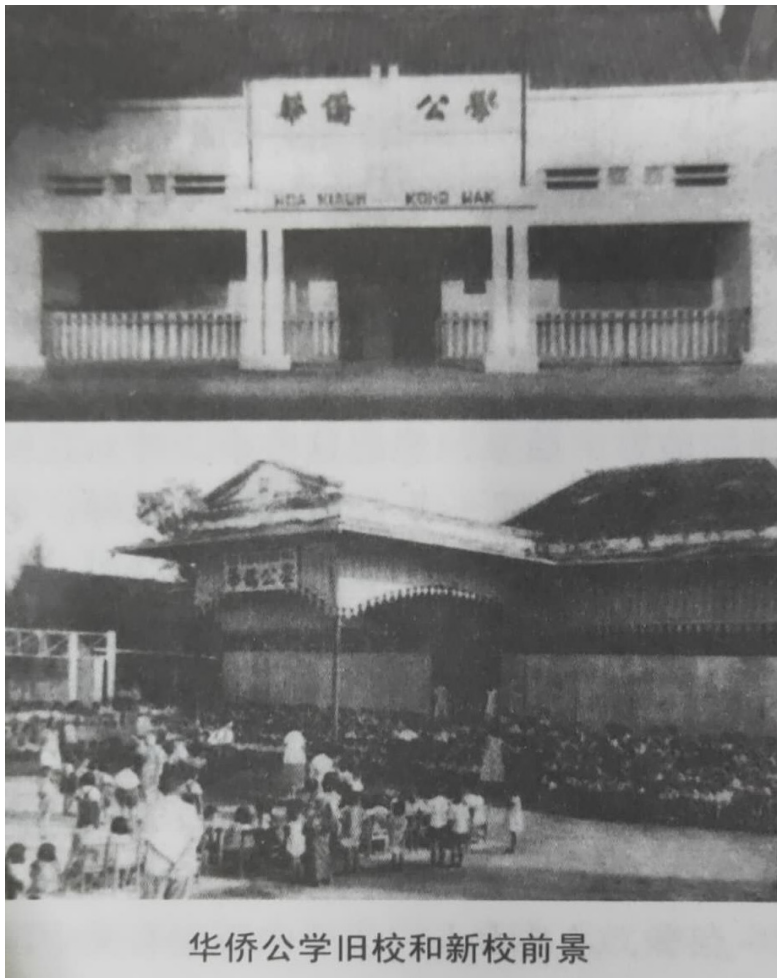


# <梁英明印尼生活回忆> 之三



华侨公学旧校和新校前景

们都以饱满的热情和认真负责的精神教课,同学们也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。在华公的两年里,这些老师们不仅给了我们许多新的科学知识,也使我们开始接触中外优秀文学作品。也许正是这种艰苦的环境,培育了同学们对母校的深厚感情。此后,师生们尽管散居各地,多年未能重新相聚,但我心中仍时时刻刻想念母校,想念当年在华公的学习生活。

华公的老师们几乎都是从中国著名大学毕业的。他们都是学识渊博而又循循善诱,最使我难忘的是我们的校长林维新老师和他的夫人国怀瑛老师。这两位老师都毕业于中国当年著名的燕京大学。林老师教我们的国文课,

他的讲解深入浅出,引人入胜,又很重视我们的写作训练。除了作文课以外,每个星期还要我们写一篇周记。这对我们提高汉语写作能力很有帮助。后来我在巴中当老师时,也要求学生写周记。这不但可以让学生提高汉语水平,老师还可以从中了解学生的思想和生活情况,加强师生间的思想沟通和感情交流。可以说,华公的教育理念正是秉承教书育人的原则。

国杯瑛老师是我们的音乐老师。在梭罗这个小地方的华校中,能够有这样好的老师来教我们的音乐课,是十分难得的。国老师教音乐课,与以前的老师最大的不同是,她首先教我们认识1代谱,我们此后学唱的歌曲也是用五线

谱记谱的,我们在音乐课上除了唱歌以外,有时还要练习将五线谱的乐曲改写成简谱,国老师教我们唱的歌曲都是中国和外国名曲。华公的音乐课把我培养成了一名古典音乐的爱好者,使我深深地感受到音乐的无穷魅力。

国老师晚年定居香港,我有机会去香港时,曾看望过她。国老师离开燕京大学多年,却始终怀念母校。她知道我在北大工作,便委托我代她向燕京大学校友会捐款。我曾买了一本燕大校友会出版的纪念刊送给她,纪念刊内有她当年毕业时的照片,她看到后感到十分开心。国老师后来在香港的养老院安详离世。

我至今难忘的另一位华公老师是教我们英文的林友仁先生。林老师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。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,他没有威严的外表,却以他的渊博学识赢得了学生们的敬爱。华公继承了当年印尼华校的一个传统,就是中英文课程并重。我们除了上课使用上海开明书局编印的英文教科书以外,林老师还让我们学习其他的英文补充教材,包括莎士比亚的作品,如《凯撒大帝》(Julius Caesar)剧本中的一些片段。林老师曾让我们背诵安东尼(M. Anthony)在凯撒被政敌刺杀后,在葬礼上发表的著名演说词。后来我在雅加达巴中任教时,曾在一家欧洲语文书店买到一部英文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(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),终于读到这部剧作的全文。我1955年回国升学时,将这部书带到北京,珍藏至今。

华侨公学只在上午上课,因为校舍狭小,也没有足够的体育活动场地,学生下课后,只能分散到玉融公会的体育场打球。那时,梭罗的羽毛球运动很普及,还经常举办城市间的羽毛球比赛,却还没有正规的室内羽毛球馆。比赛多半选择在周末晚上举行,主办者一般租用一座大型仓库作为场地,加装几盏大的煤气灯提供照明。这些临时比赛场地当然没有观众座位,狂热的球迷们只能坐在地上或者站立观看。尽管场地简陋,每次比赛都吸引不少观众,在场外不时可以听到观众鼓掌叫喊的声音。我是这些热情观众之一。

每天下午,我在家做完功课,都要按照父亲的要求,练写毛笔字,包括两页九宫格

的中楷和一页小楷。祖父留下的墨宝成为我最早临摹的范本。不久,我开始临摹颜鲁公(真卿)和柳公权的书法。家里的少量藏书是我的主要课外读物。这个时期,我读了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》《西游记》等古典名著,以及《蜀山剑侠传》《七侠五义》和《隋唐演义》等小说。这些书使我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初步熏陶。

梭罗侨众生活社

日本投降后,梭罗一些爱国华侨青年成立了一个小团体,称为侨众生活社。在我看来,这个团体似乎有些神秘。我不知道它的会所在什么地方,有多少社员,也不了解它有些什么活动,只知道我认识的几位比我年纪大的同学都曾是这个团体的成员。后来才有人告诉我,在雅加达、泗水、三宝壟等地都有这类团体。

日本占领时期,印度尼西亚一些爱国华侨曾参加秘密的抗日组织,称为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,并在梭罗设立了一个支部。梭罗侨众生活社的创建者和骨干就是原大同盟的成员游禄中、钟翠兰、李笑梅、张春山、李尊贤、李最贤等人。我后来得知,侨众生活社曾经想邀请我加入他们的队伍,但因为当时年纪太小,最终没有让我参加,而只告诉我可以到他们的图书室借书看。他们的图书都是在中国大陆或香港出版的新书,存放在我的一位同学的家里,图书的内容大体有两大类,一类是文艺小说,如巴金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等。另一类是《大众哲学》《社会发展史》等通俗理论读物。我在课余时间,曾借阅这些书籍,而且很快便被这些书中的新思想、新观念所吸引,对祖国

的前途充满了美丽的憧憬,尽管它还只是模糊而浪漫的理想。在我当时读到的新书中,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对我的影响最大,可以说它是我日后走向革命的启蒙读物。

梭罗侨众生活社的兴旺时期似乎不长。由于荷兰殖民者发动战争迅速占领雅加达、泗水、三宝壟等沿海城市,新生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被迫退守到中爪哇的日惹和梭罗地区,对外交通几乎隔绝。侨众生活社那些朋友和同学大都先后离开梭罗,我也没有再听到关于侨众生活社活动的消息。不过,1947年7月我到雅加达巴中读书后,又见到了它的一些骨干成员,也知道在雅加达有一个称为大众社的类似团体。这时,我逐渐明白侨众生活社和大众社在华侨社会里的影响和作用,我没有加入过这两个团体,但后来与它们的许多社员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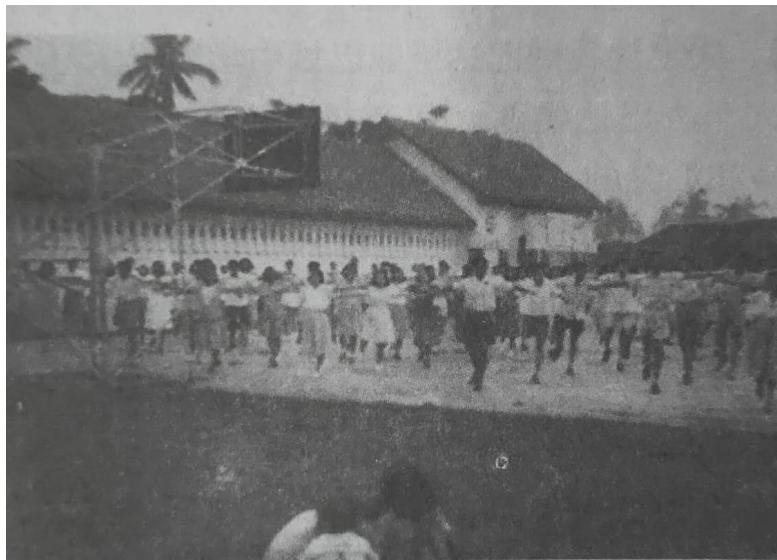
## 考入巴城中学

1947年6月,我在梭罗华侨公学读完初中。当时,梭罗华侨创办的华文学校都还没有高中部。初中毕业后想升学,只有到巴达维亚(雅加达)、泗水或三宝壟等大城市去。父亲和学校老师们商量的结果,决定让我到巴达维亚巴城中学继续学习。

7月11日,我和两个同学一起坐火车去巴达维亚。父亲在巴达维亚有一位老朋友冯伯伯,他在草埔有一家经营贸易和汇兑的“平平公司”,我就住在公司的楼上。那两位同学也分别住到他们的亲友家中。我很幸运地考入了巴城中学高中部。巴中是1945年10月创立的一所新



1950年,韦同芳老师带领高三甲班同学参观工厂后留影,右一为韦同芳老师



巴城中学学生集体做操